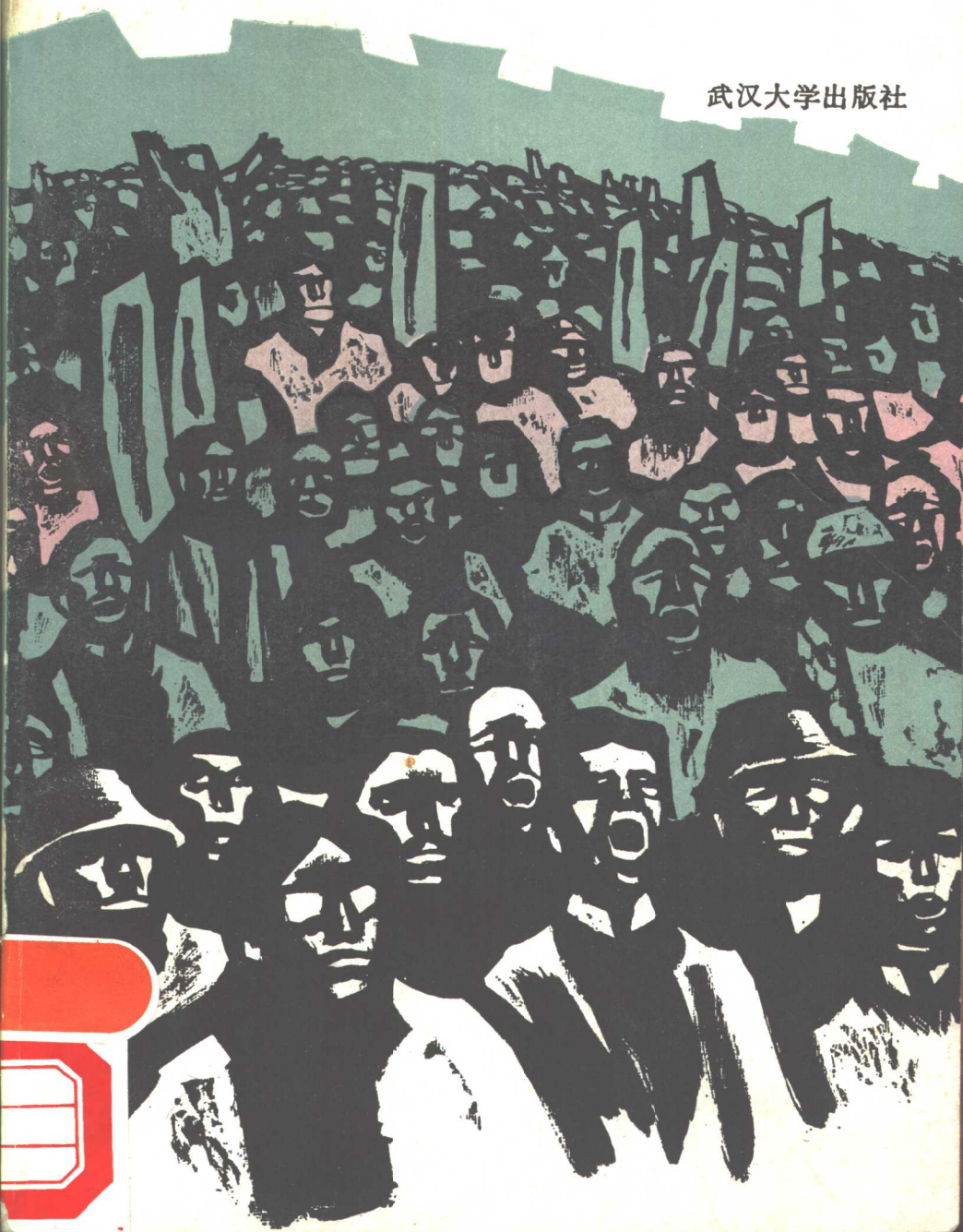


徐铸成新闻评论选

武汉大学出版社



徐铸成新闻评论选

徐
铸
成

武
汉
大
学
出
版
社

徐铸成新闻评论选

徐铸成

*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武昌 珞珈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10.25印张 插页2 25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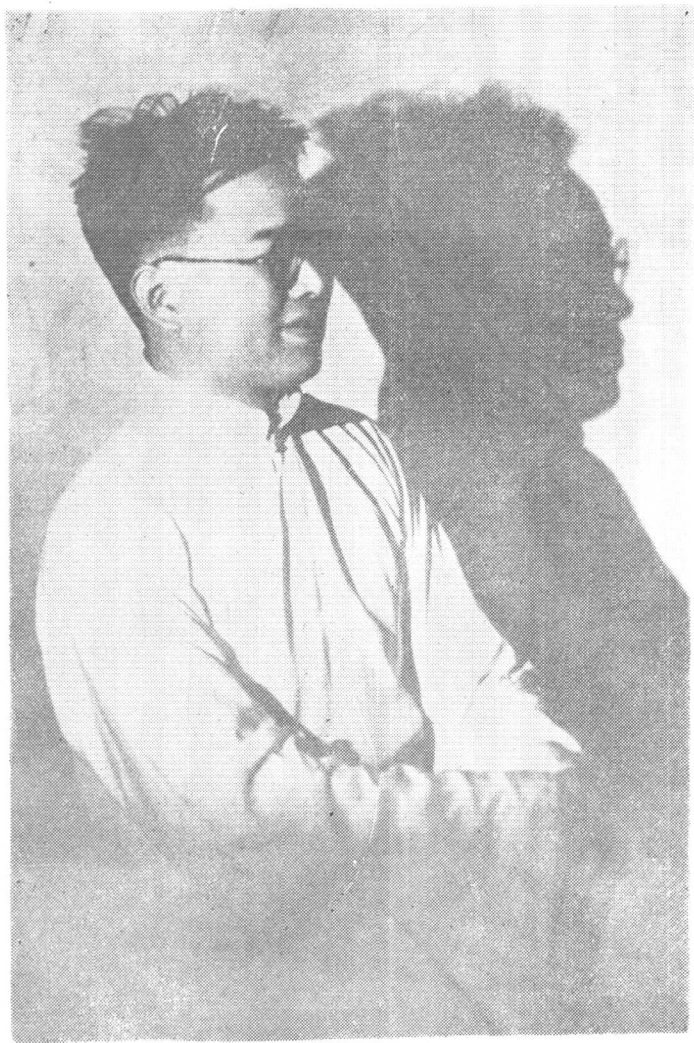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730 (平装730)

统一书号: 7279·23 定价: 2.15元



作者像（摄于1941年）



作者像（摄于1934年）



作者像（摄于1984年11月·武汉大学）

前 言

当我刚跨进新闻界大门的时候——一九二七年冬，我国的一些所谓大报，已经象当时国际知名的报纸一样，每天必有一篇社论（或称社评），紧紧扣住前一天国内外发生的重大新闻，加以分析、评议；并代表报社，对是非曲直，作出判断，表示态度。不再以“时评”、“专论”的形式，刊登些不痛不痒或时间性不强的政论性文章了。

两年以后，我正式担任报纸的编辑工作，总编辑是当时最闻名的新闻评论家张季鸾先生。他写的每一篇社论，读者争阅，真可说是万人传诵的。但我曾听他说过，而且是很诚恳地说的：“报纸的社论，都是极短促时间里赶出来的急就章，未经细细推敲，生命力是极短的，没有保存的价值。如果写作者力求精进，看了若干年前的旧作，会脸红的。”所以，他生前从来没有出版过什么集子，逝世后才由别人代集一本“文存”。

十几年后，我也混在“后浪”里，开始作文了。先是为人代庖，偶然“客串”，以后正式主持“笔政”，从一九三八年初起，直至一九五七年被迫搁笔为止，历时二十年。所写的社论和时事性文章，总不下两千篇吧；短评小言，更难以约计。但我牢记那位前辈的话，也从不留底或剪存，因为我有自知之明，无论在功力上，在文采上，都比那位前辈差得很远，如何敢敝帚自珍呢！

学生贺越明君，潜力研究我国近现代报刊评论和评论家，曾在京、沪等各地较大的图书馆广泛收集资料，也把从“孤岛”时期的《文汇报》起，凡我主持“笔政”时期的报纸，包括香港、桂林、上海《大公报》和上海、香港《文汇报》的社论、短评基本搜齐了。为了辨认（因为各时期都有别人执笔的），要我翻阅了一遍。我汗流浹背地从头看这些旧作，认识到有些观察太肤

浅、观点太幼稚，至于结构的不够严密、文辞的稍欠通畅隽永，犹其余事。这些东西，正如那位前辈说的，事过境迁，只宜覆瓮了。

一些从事新闻教育工作多年的同志，了解这些情况，认为加以编次，可以作为学生的补充读物，也可为关心近代历史的同志，提供一些研究的素材。武汉大学新闻系的同志，也极力鼓励我加以整理，愿由该校付梓。贺越明同学对此很热心，独立完成了搜集、整理和编次的工作。

在旧社会，我是一个职业的新闻记者，觉悟不高，所追求的，只是国家独立、富强，人民摆脱贫困和欺压。为此，曾以秉笔直言自许，报馆虽屡遭查闭，个人曾长期受歧视、恫吓，而未尝动摇。今天重翻旧作，虽自觉幼稚可笑，而并不“悔其少作”。因为，作为一个报人，无心的失误是难免的，有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即使在高压之下，也是不可原谅，要受人民和自己良心的谴责的。

我国自有近代报纸的一百多年中，优秀报人辈出。他们接受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争取光明，揭斥黑暗，为此而受恐吓、监禁甚至牺牲性命的，不知凡几。象我这样的平凡报人，能留存到解放以后，还能为人民的新闻工作贡献力量，尤其在经过二十年坎坷后出现的历史上少见的美好时期以来，还有机会发散“余热”，真正由衷的感激而倍感幸福。

我开始试写社论，在一九三三年左右。那时，我当天津《大公报》的驻汉口特派记者，工作并不繁重，年轻，且精神旺盛、如饥似渴地想多读书，多练笔。那年，一位姓李的同业创办《大中报》，延万枚子兄任总编。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每周为他们“客串”一两篇社论。这张报，大约只维持一年多就停刊了。一九四二年初访重庆，听说李已在乱机大轰炸中罹难了。枚子兄则年逾八旬，现在北京欢度晚年，精神还很矍铄。

一九三四年，《大光报》在汉创刊。主持人赵惜梦“九·一

八”前在哈尔滨《国际协报》任职时，兼国闻通讯社记者。因为这个关系，故政之先生函嘱我尽力给以协助。创刊之初，我曾参加要闻版的编辑，也写过几篇社论。等到一切上了轨道，销路打开，因为他们的编辑部力量相当强，我就不再插手了。

一九三六年《大公报》创刊上海版，调我任要闻编辑，兼为《国闻周报》编“一周大事记”，并写“一周大事述评”。周报的主编杨历樵兄，还经常怂恿我写些时事性的专论。这是我经常写作政论的开端。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沦为“孤岛”。十二月，《大公报》上海版及《申报》、《立报》等自动停刊。因为租界当局在日军高压下，通知各华商报纸，一律要将稿件事前送日方检查。

翌年一月初，《文汇报》以英商名义创刊，我“承包”了全部社论。二月，正式参加，任主笔，实际负责全部编辑、言论工作。从此以后，我二十年如一日，每天绞心血，担风险，熬夜到天明，在一个报里“挑大梁”、“唱主角”了。

办报是一桩危险的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尤其如此。

中国从来没有言论自由的传统。从清末革新运动激化以后，以言论获罪坐牢、鞭死、痰死、投海的，就有邹容、章太炎、沈荃、陈天华等。辛亥以后，禁锢更密。北京的报馆，动辄被封；沪、津、汉各地租界的报纸，勉可存立；而其驻京的记者，一旦报道真实消息，揭露其黑幕，军警督察处（袁世凯时代的特务机关）之类的军警黑手，立即出动，轻则关押，重则枪决，邵飘萍、林白水等都是因而牺牲的。但北洋军阀，毕竟是粗人，对付舆论的手段比较简单，一手金钱，一手刀枪，如此而已。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登场以后，因为帮闲群中有一些曾舞弄笔墨的“秀才”，有的还曾是搞报的行家，出谋献计，文网日密。钳制的方法，也层出不穷，办官报，办统一的通讯社；对一般报

纸，或强加官股，或强派编辑、记者就近监督；对租界报纸，则利用流氓及党部势力，贿通洋人，实行越来越严密的报刊检查制度，凡他们认为违禁的新闻或评论，或全文禁刊，或部分删节，起先还可以“开天窗”——被禁刊的字句填以“□□”，以后，一律要把天窗堵塞，把连不上的删剩的句子，设法连结起来。

一九三六年我初到上海当要闻编辑时，每晚一定要等新闻检查处“检迄”的稿子发回来，赶快动修补手术，才通知机器房开印。

一九三八年我开始主持笔政时，所受的压制就更加复杂而严酷了。《文汇报》是挂英商招牌的，稿子可免于敌人的检查，但他们也用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经常有爱国者被绑架和杀害，租界里也一片刀光剑影，暗杀成风。《文汇报》因坚持抗日救亡，揭斥敌伪阴谋，不断受到恫吓、威胁，先后被投掷炸弹三次，送死人手臂、毒汁水果等以死相胁也有几度。

那个时候，我曾在宁绍保险公司保了二千元人寿险。可见，我也不是全无精神准备的。

比敌人的威胁更难对付的，是租界当局不断的警告和所雇“保镖”的捣乱，动不动就指我们为违反英国的中立立场，危害租界的安全地位；而那位以每月一千几百元雇来的“保镖”——英人克明，则一直想伺机夺取编辑控制权，每加掣肘和吹毛求疵。最后，还企图把报纸出卖给汪伪。这阴谋，被我们及时觉察和粉碎了。

谈到这里，可以补叙一个插曲。我曾写过回忆当时斗争的史料，有人不仅为自己辩护，还为克明翻案，说克明并不曾同我斗争，也没有被迫辞去董事长这回事，他写的“更正”，是征求过邵伯南（红叶）同志同意的。

红叶同志是《文汇报》创刊初期的主要记者，受克明的迫害，去武汉采访，不久即去西北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解放后，曾任《天津日报》总编辑。一九五七年，我们曾一起去苏联访问。

在十年“文革”中，他也备受折磨。去年夏天，来沪重叙契阔。他说，根本没有人向他征询关于《文汇报》史实的事，反而在“文革”中无意得知一段珍贵史料。原来，在造反派批斗他的“罪行”时，说《文汇报》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报纸，他参加过《文汇报》，自然是历史“罪证”。造反派还特地派人来上海“外调”，经上海“市革会”批准，翻阅公共租界档案，有克明的职务卡片，注明是“工部局密探”。那个造反派对历史一无所知，查抄了回去给红叶看，想加重、证实他的“罪状”。

这一下，不仅让红叶同志了解到当年压迫他的是怎样险恶的敌人，也使我恍然大悟，原来与我对阵的，是这样一个暗藏的好细。

《文汇报》创刊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初。那时，国民党军已“弃守”上海两个多月，敌军一面在租界四周企图巩固其占领，建立“新秩序”；一面在租界里制造恐怖，诱胁地痞、败类拼凑“大道市政府”、“维持会”等汉奸组织，原上海公商会会长傅筱庵、天主教败类陆伯鸿以及流氓商人尤菊生等纷纷“落水”。租界百万居民，抗日的情绪极高，而粮食紧张，物价飞涨，生活日益困难。敌人出版的报纸，除日文《日日新闻》外，还有《新申报》，公开宣布“大东亚新秩序”，面目极明显。另外，由“落水”报人余大雄、钱芥尘以及红帮头子徐某等，先后改组出版了《神州日报》、《生活日报》以及《晶报》等；加上面目模糊的《时报》等，则以“悲天悯人”的口吻，鼓吹“和平”，唱出反对“战争”的调子，欺骗性相当大。英文《字林西报》和《大美晚报》则维持其本国的“中立”立场，只对日军的暴行，有所揭露和抨击。《大美晚报》的中文版，已由宋子文收买，但也只能在美方许可的范围内，以“中立”口吻，同情中国抗战。此外，还有以洋商名义出版的《华美晚报》，则态度时冷时热，不为读者重视。《每日译报》态度最坚决，但那时还只能以译载外文报刊上同情中国抗战的消息和文章为主要内容。

《文汇报》应运而生，以坚决的态度，宣传抗战到底，揭斥敌伪的阴谋，鼓励孤岛人民发扬爱国大义，保持民族气节，爱憎鲜明，立场坚定。因此，得到广大爱国同胞的热烈支持。出版不到半年，发行即突破六万份，成为孤岛销数最大的报纸（《新闻报》历来是上海最畅销的报纸，那时因接受日方新闻检查，为读者所鄙弃，发行跌至五万份以下）。不久，态度进步的《导报》，也以英商名义出版；《译报》则改出大张，内容不再限于译文；又出版了《大英夜报》，态度也较坚定。以这四家报为核心，形成了宣传抗战爱国的阵地，占了压倒优势。

我就在这时，结识了恽逸群同志，相濡以沫，在斗争艰险时，相互鼓励，交换消息。他那时已是新闻界的奇才，博闻强识，下笔成篇。他除主持《导报》外，听说还不时为《译报》撰写社论。

危险和困难，最能磨炼人的思维。要千方百计排除困难，战胜敌人，就得用心倾听广大读者的声音，开动脑筋，提高自己的写作、编辑艺术。天天空喊“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老调，是不行的。必须随时注意形势的变化，针对敌人的动态，理解读者的心情，以多种多样的手法，以饱满的战斗热情，去感染读者，使敌人颤抖，使动摇者悬崖勒马，从“水”边回头。比如，当敌人拼凑南京的傀儡组织时，我们及时揭露他们的阴谋。以汉奸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登场那天，我们写了一篇《无题》的社论，反复指出它象僵尸一样，企图借用“中国”的名义“还魂”，欺骗人民，是不会有好下场、也不会逃避历史的惩罚的。我们把南京傀儡登场的消息，拼在社论的旁边。恰巧，老牌汉奸郑孝胥——已被敌抛弃的伪满大臣死讯传来，我们把它加了一个框，“镶”在中间，暗示这是一切为虎作伥者必然的下场。为什么“无题”呢？因为租界当局不容许过分刺激的标题，只能“此处无题胜有题”了。

在此前后，国民党“下野”将领周凤歧在其寓所被爱国者枪

杀。他原是浙江的土军阀之一，北伐军到上海前倒戈，而且曾被充当“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工具。以后，“秋扇见捐”，所部也被改编、吞并了。怀着对蒋的忿恨，加上敌人诱劝，许以“军政部长”的名义，他也准备“上任”了。不料，一弹飞来毙了命。对这样的民族败类，本来可以痛痛快快骂一顿。但我想，让读者痛快一阵，意义并不大，而且，毕竟他还未“落水”。借这题目，细细分析汉奸心理，分析他们权欲与良心的斗争，指出他们必将蒙受人民和历史的审判以及家属子孙将受的影响，这样苦口婆心的立论，也许可以挽救一批正在“水”边徘徊却顾的人。于是，我写了《周凤歧之死》。

在“孤岛”《文汇报》出版时期，国民党抗战还比较积极，公开反共的事件，还没有发生过。不论从哪方面传来的抗战胜利新闻，我们都大事宣传，突出刊载。尤其如平型关大捷，我们标出是“七七”以来中国的首次大捷，和台儿庄胜利一样用大字标题，刊之显著地位。

副刊上，更不断刊出描述西北高原活跃气氛的“来鸿”，也刊登过史沫特莱的连载。在《文汇报》创刊后不久，我就写过一篇社论，展望西北战场，认为那里不仅自古是决定战局的重要地区，而且那里已有训练有素、身经百战的军队，正在横戈跃马，与敌人周旋。这是鼓励沦陷区人民，不要因东南战场步步失败而丧失信心，而且暗示胜利的曙光已在西北闪耀，暗示中国的希望在西北。应当说，那时就看到这点，并清楚地写出来，作为一个无党无派的新闻记者是要有些远见和胆识的。

应该指出，“孤岛”上当时有不少进步和革命人士，默默在做艰苦的文化宣传工作。复社编印了《鲁迅全集》，我是首批预订者之一，初版本迄今还排列在我书橱的上层。斯诺的《西行漫记》，不久就在“孤岛”翻译出版。还有美国记者根室写的《亚洲内幕》，也于此时翻译出版。这些书，都是我珍视的精神食粮。

在戏剧界，也有不少前趋者在踏实地以这种暗示或以古喻今的手法，鼓励“孤岛”的正气。周信芳先生先后公演的《正气歌》等，轰动了“孤岛”。我在寸步荆棘——时刻可能遭到伏击的情况下，曾化装去今复兴西路某偏僻会场，看苦干剧团演出的话剧。《文汇报》被迫停刊后不久，我携妻挈子，同到当时的浦东大楼，看于伶编写的话剧《葛嫩娘》。散戏时，因暴雨积水，我们冒雨涉水回家——当时我家在今复兴中路，过巨鹿路一带，水深没膝，到家时，上下都湿透了。

《文汇报》停刊后，胡政之先生“函电交驰”，促我速回《大公报》，主持香港版的编辑工作。我清了《文汇报》后事后，七月底始成行。从此以后，直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由于太平洋大战爆发而休刊，我主持港版笔政达两年半。

《大公报》自一九二六年九月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先生接办复刊后，社评一向由他们三位亲自轮流执笔，归张统一润色，从不让别人插手，因为读者也承认社评是《大公报》最大的特色。他们力求精益求精，不让它降低质量。若干年后，才由杨历樵兄参加，写些纯国际问题的社评。一九三六年上海版创刊，吴鼎昌早到南京做官，名义上辞去社长职务，胡、张则都迁居上海，以上海版为经营重心，留王芸生兄在津任编辑主任，开始在津版写些时间性较强的社评，其余重要社评，仍由张、胡执笔，以电报打至天津，与沪版同时见报。

杨历樵兄也来上海，仍主持翻译、编辑《国闻周报》，仍继续写国际问题的社评，每月大约二、三篇。一九三七年初起，他们也偶然出个题目，口授大意，叫我试写，经修改刊出，还额外给以稿酬二十元——当时白米才四元一石，更重要的是我得到了精神鼓励。

我初到香港时，张季鸾先生也适由渝来港勾留。他起先还要审阅、润色我的社评稿，不久，就完全放手不问。不仅我自己的稿子写好即付排，别的同事写的稿子，也归我一手润色了。当时

撰写社评稿的，除厉樵兄外，还有袁道冲老先生和李纯青兄。

去年八月，我和贺越明同学为了补齐这本书的旧稿，曾几次赴北京图书馆查看当年香港、桂林《大公报》的胶卷放大图象，我才吃惊地回忆起当时香港当局对华文报禁网之严！

自然，行动是不象“孤岛”那样成天关在铁笼里，时刻有挨冷枪、被炸死的危险，而是可以放心工作，也可以在工余时间，约朋友去咖啡馆或酒楼任意谈天了。但报纸所受的删检、压制，则比上海租界更加严厉。这次我们翻看旧报，不仅在社评中看到成串成串的“天窗”，而且发现有好几天的社评地位，全部空白，注明“全文被扣”。可见，资本主义国家鼓吹的言论自由，至少在殖民地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现在香港报纸的禁网，自然大非昔比了。这是国家独立、开始强盛和当地居民多年奋斗的结果，不是社会制度先天产生的。

当时的报纸，不准出现“抗日”字样；自然，更不许“抗敌”。因为多年的英日同盟虽不复存在，英国的在华“利益”虽遭到损害，但香火旧情仍在，对旧侣还要保持“中立”。当然也不能批评英国的政策，连“帝国主义”字样也不许出现。否则，就是“指着和尚骂贼秃”了。

它们标榜法治，事事有法规。但这些法令、法规，也象松紧带一样，随时有松弛余地的。

从一九四〇年开始，国内已开始发生几次反共高潮。《大公报》香港版的社评，凡关国内问题的，向例由渝版打小样航寄（当时，渝港间每天有夜航），港版转载。我抱定一个原则：“家庭”纠纷不宜纷扬。所以，有些争论性的文章，不予转载。

记得太平洋大战爆发后，日军攻入九龙，如入无人之境。九龙十一日即陷落，隔海炮击香港，《大公报》港刊于十三日宣布休刊。我曾写了《暂别读者》的社评，勉励海外同胞保持民族气节，发扬我侨胞的爱国传统，使将来重见时，彼此都不赧然内疚。去年，我在北京图书馆翻阅港版旧报时，胶卷到十二月四、

五日就停止了。显然，从此以后，敌舰、敌军已包围港九，报纸寄不出来了。那几天，我天天写一篇社评，自然永远——除非在香港某些图书馆，都无法查到了。

桂林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以“文化城”闻名。因为广西一向是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的“封邑”，在抗战中，还保持它独特的统治体系，蒋的特务势力，不能为所欲为；加上当时名义上是西南最高军事首脑的李济深——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倾向开明，暗中保护了一批进步人士。从京、沪、平、津逃到后方的文化人士和进步文化企业，受不了重庆的窒息，纷纷迁到桂林。

据传说，在抗战初期，到桂林的“外江人”还屈指可数，邮差每收到一些从外省寄来而无法投递的信件，只要站在市中心的十字路口，看到有衣冠楚楚的外江人经过，拉住他们查问，往往会查得收信人。

一九四二年二月我从香港逃到桂林时，市区已大大扩展，到处搭起简易的房屋，市中心有不少饮食店、书店、拍卖行、旅馆及其它行业，已相当繁庶，人口大约有三四十万了。

早在一九三三年前后，胡政之曾由津游历广西近半月，写了好几篇通讯。当时，李、白正处在蒋桂战争失败，退守“老巢”，吹出“自治、自卫”等“三自”政策之后，胡对此颇有好评。加上桂系的客卿邱昌渭（时任厅长）等又是他的旧识，因此彼此都留有较好的印象。

一九四〇年初，他看到香港“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把港馆的大权“下放”给了金诚夫兄和我，亲自去桂林联系、踏查，在七星岩侧背圈租了一片荒地——大都是无主坟堆，平整后修盖了一批竹木结构的房屋，并运用港馆积余的资金，购了六、七架平版印刷机及铅锌、铸字机、铜模等，陆续运桂，连他的家眷也迁去了。一切加紧筹备完毕，于一九四一年初创办了《大公